

# 父母支持性的性溝通、溝通信念與親子 性溝通關係之探討—以台北市高中、 職親屬為範例

鄭其嘉

輔仁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晏涵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劉潔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張興榮

財團法人新光醫院  
遠距服務中心

過往親子性溝通的研究多半注重溝通的量，而忽略溝通的質，使研究結果無法告訴父母該如何溝通。本研究旨在了解溝通因素對父母親子性溝通之影響，以做為學校或機構設計親職教育與輔導之參考。研究樣本為 159 位台北市高中職父母。研究工具包括：性溝通主題、支持性的性溝通（Supportive Sex Communication）量表、家庭性溝通信念、性溝通態度、溝通過程與人口學變項等。支持性的性溝通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顯示量表符合理論架構。統計分析控制性別、年齡、社會經濟地位等人口學變項。研究發現，性溝通議題可依據其敏感程度分為三類：廣泛性議題、狹義性議題與禁忌性議題，其中廣泛性議題溝通頻率最高，禁忌性議題率最低。複迴歸控制社會人口變項後顯示，影響這三類議題的因素不同，其中支持性的性溝通分數愈高，則廣泛性議題與狹義性議題溝通頻率亦愈高。母親以及對自己的溝通效果愈沒有期待的，廣泛性溝通頻率亦愈高。對禁忌性議題而言，沒有一個變項具有預測力。另外，支持性性溝通分數高的父母對孩子較信任、對溝通效果較沒有期待、溝通過程較願意開放自己、較尊重孩子想法，其性溝通滿意度亦愈高。本研究對研究限制提出討論，並對親職教育如何協助父母跟孩子談「性」，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支持性溝通、親子性溝通、驗證性因素分析**

\* 通訊作者：劉潔心，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e-mail：t09010@ntnu.edu.tw；02-7734-1727。

## 壹、緒論

青少年的性教育一直是教育者以及父母所關心的課題，近年來的研究發現，青少年性行為的發生年齡下降、有性經驗的青少年比率升高（林惠生，2002；晏涵文、劉潔心、鄭其嘉，2009），而發生在青少年之間的性交易、性侵害、未婚懷孕以及 HIV 感染之比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加強青少年性教育已是刻不容緩。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父母也應負起性教育的責任。「父母」其實是孩子的第一個「性教育」老師，一個人的性觀念建立於幼年期，幼小的孩子透過與家人的互動體會到親密、認識自己的身體，並學習性別角色。進入青春期之後的青少年，性荷爾蒙開始發揮作用、身體變化快速、認知能力提昇、社會角色增加，更需要父母協助他們度過青春期的尷尬與不安，而父母在家庭互動中所呈現出來的性態度與性價值觀，也在無形中塑造青少年孩子對「性」的看法與感受（晏涵文，2004；Rosenthal, Senserrick, & Feldman, 2001）。當父母重視孩子的性發展，願意透過家庭互動示範、關心並傳達正確的性觀念，孩子也會重視自己的性發展。

Jaccard、Dodge 和 Dittus（2002）指出，父母與小孩談「性」，可以讓孩子了解父母關心自己的性健康，無形中影響孩子對性行為的做決定歷程。美國早期研究發現，當母親為青少年主要性教育來源時，青少年第一次性行為的年齡較晚、性伴侶數目較少（Brody, Ottey, & Lagranade, 1976; Spanier, 1977）。Fox（1981）發現，母女之間討論性交及生育控制的溝通頻率，與女兒使用避孕有正相關。Whitaker 與 Miller（2000）發現，有較多親子性溝通的青少年比低親子性溝通青少年，更能免於同儕的影響。國內的研究方面，羅樊妮（2004）研究指出，親子間對與「性、婚姻」相關主題的溝通愈頻繁的青少年，其婚前性行為態度愈保守，且兩性關係態度愈平等。專家普遍認同家庭性教育具有正面的效果（Darling & Hicks, 1982; Newcomer & Udry, 1985）。

雖然親子性溝通很重要，然而在家庭中，「性」卻很少被談論。大部分的研究顯示，「媒體」與「同儕」是青少年性訊息的主要來源，而「家長」幾乎不被青少年列為性知識的來源（林惠生，2002；晏涵文、蘇鈺庭、李佳容，2001；單玉安、鄭其嘉、孫鳳卿，2008；張美皓、晏涵文，1995；羅于惠、鄧鳳苓、瞿馥苓、林雪蓉、史麗珠，2008）。例如：羅于惠等人（2008）針對桃園地區高職學生做了一項性知識及性教育需求的調查，發現在兩性交往和選擇男女朋友的知識來源，以朋友、同學（69.7%）所佔的比例最高、老師學校課程（56.2%）次之，電視廣播（41.9%）又次之；在性行為的知識來源，以老師學校課程（62.9%）所佔比例最高、朋友同學（44.8%）次之，電視廣播（44.0%）又次之；

在懷孕、避孕的知識來源，以老師學校課程（70.2%）所佔比例最高、電視廣播（42.9%）次之，演講（33.8%）又次之。

影響父母跟孩子談「性」的因素是什麼呢？過往研究發現，父母本身的性態度以及對家庭性溝通的信念為兩個主要的影響因素，例如：受到傳統社會文化中保守性觀念影響，認為「性」是骯髒的、羞恥的；談「性」時感覺不自在、不舒適；擔心談了之後，子女反而會去嘗試性行為等（林燕卿、晏涵文，1999；張美皓、晏涵文，1995；廖梨玲、洪栩隆，2006）。

除此之外，溝通的方式與當時的氛圍，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例如，Dubbe（1956）研究發現，青少年覺得與父母談「性」很困難，因為感覺到「恐懼」與「被責怪」。由於青少年與父母談「性」時有諸多顧忌，難怪青少年不喜歡與父母談「性」。如果父母知道該用何種態度、何種方式與孩子談「性」，不但會提升談「性」的自我效能，更能使孩子願意跟自己談。然而，很可惜的，過往大部分的研究只注重親子間「是否」有談「性」，或談些「什麼」，而忽略了「怎麼談」的因素。也就是說，忽略了溝通的「過程因素」與「品質(quality)因素」(Jaccard et al., 2002; Lefkowitz, 2002)。如果研究無法告訴父母該「怎麼」談「性」，例如：該用何種態度？何種方式？最後，父母還是不知道要如何做，親子性溝通頻率仍然無法提升。

「溝通」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互動過程，溝通時的氣氛（climate）影響了溝通的內容與過程，決定了溝通品質與持續溝通的可能性，也影響溝通的效果。Gibb（1961）根據小團體的互動行為，指出兩種溝通氛圍（climate）——「防衛性」（defensive）以及「支持性」（supportive），造成不同的互動方式與溝通效率。當溝通一方發出「防衛性」的溝通訊息時，也會引發對方相當的防衛性，會降低溝通效率，例如：無法正確體會對方所溝通的訊息內容，這種溝通氛圍會抑制雙方繼續互動，溝通不容易持續。相反的，如果一方發出「支持性」的溝通訊息，則也會引發對方的「支持性」溝通，這種氛圍鼓勵雙方繼續互動，使對話能持續進行，容易達到溝通效果，也就是說溝通氛圍會相互引發，具有交互循環性（reciprocal）。

根據 Gibb（1961），「防衛性」溝通為一種具有威脅性或具有逞罰對方之意涵的溝通行為，當訊息接收者認知到溝通者發出的訊息具有威脅性，或期待溝通者會發出威脅性的訊息，溝通者所呈現的即為「防衛性溝通」，防衛性溝通也會引發對方的防衛性，如果一直持續下去，最後會造成溝通失敗或破壞性的後果。它有六項特徵：評斷的（evaluation）、控制的（control）、謀略的（strategy）、中性化的（neutrality）、優越感的（superiority）、確定的（certainty）。而「支持性」溝通則指溝通中對訊息真誠地尋求與給予、自然地求解

決問題、同理的了解以及平等，其與「防衛性」溝通是一體的兩面，因此「支持性」溝通相對應於「防衛性」溝通，也有六項特徵：描述的（descriptive）、問題取向的（problem orientation）、自然散發的（spontaneity）、同理的（empathy）、平等的（equality）以及暫時性的（provisionalism）。亦即，以「描述」事件取代「評斷」事件；以「問題取向」做雙向互動，而非去「控制」溝通過程；以「自然散發」的開放態度取代隱晦的「謀略」式溝通；以「同理心」去感受，而非冰冷的「中性化」；以「平等」的位置溝通，取代「優越感」；並以「暫時性」的心態理解道理，取代沒有彈性的過分「確定」（Rozema, 1986）。這樣的溝通方式，使得內容不但容易被對方所理解與接受，也會鼓勵對方持續地回應與互動，因此支持性溝通是較佳、較健康的溝通方式。

Gibb (1961) 的理論在實務上的應用相當高，學者、訓練員、心理諮商或治療師等常應用理論中的原則進行人際關係訓練或諮商與治療 (Kingstone & Endler, 1997)。理論應用或研究的對象相當廣泛，包括如工作場所員工 (Becker, Halbesleben, & O'Har, 2005)、親密伴侶 (Becker, Ellevold, & Stamp, 2008)、家庭成員 (Barton, Alexander, & Turner, 1988) 等。學者指出，防衛溝通多來自個人對改變的恐懼 (Baker, 1980)、知覺個人的欠缺 (flaws) 被暴露或被攻擊時的自我保護 (Stamp, Vangelisti, & Daly, 1992) 等。研究發現，工作場所領導者的防衛性溝通會影響其與員工的關係，也跟員工的職業疲勞有關 (Becker et al., 2005)。當說服性溝通會引起對方的抗拒時，溝通的防衛氣氛會升高 (Eadie, 1982)。反之，支持性溝通技能訓練能降低人際衝突 (Alexander, 1979)。

在家庭方面的研究則發現，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比一般青少年家庭更常表現出防衛的溝通型態 (Barton et al., 1988)，適當的家庭介入治療活動可以降低親子間的防衛性溝通 (Robbins, Alexander, & Turner, 2000)。Alexander (1973) 發現，父母的支持性以及防衛性溝通訊息與孩子的支持性與防衛性訊息具有顯著相關，且兒子在學校的攻擊行為與母親的防衛性訊息顯著正相關，與父親以及母親的支持性訊息呈顯著負相關。而 DeSalvo 與 Zurcher (1984) 的實驗研究發現，在管教情境中，父親的防衛性溝通與其對自己教養能力的自我評估有關，對自己教養能力自我評估愈低者，愈為防衛。Rozema (1986) 認為，親子之間雖然均希望能有更多機會談「性」，但卻難以付諸實行，其障礙因素之一可能為談「性」時的氛圍因素，其應用 Gibb (1961) 的溝通理論發現，青少年覺得同儕間的性溝通，較親子間的性溝通具有支持性，這個可以部份解釋何以發生在同儕間的「性溝通」頻率要高於發生在親子間的性溝通，因為同儕間支持性的溝通讓青少年覺得自己被同理、心聲被聽見、觀點被接納，所以願意回應更多的溝通。可見，如果父母親能學習以支持性溝通來跟孩子談「性」，則孩子也會被鼓勵以支持性訊息回應父母的溝通，使得雙方能充分且有

安全感地傳達想說的訊息，達到溝通的目的。

一個開放、誠懇、具備同理心的性溝通是受孩子歡迎的，例如：Pistella 與 Bonati (1999) 訪談青少年發現，青少年希望他們的父母能用較為開放與平等的態度與她們談性。這種溝通氛圍使孩子能接受到較多的訊息，也比較容易對孩子產生正面影響，例如：Rozema (1986) 發現，青少年與母親之間的性溝通較與父親具有支持性，而青少年覺得從母親處獲得的性訊息也較從父親處獲得的為多；Warren 與 Neer (1986) 發現，家庭中支持性以及防衛性溝通會影響到孩子對家庭性溝通品質良弧的評價，愈感覺家中支持談「性」的青少年，愈覺得家庭性溝通愈自在、愈有收穫，也覺得家庭在性教育上扮演愈重要的角色。Guzman 等人 (2003) 研究指出，當青少年覺得與母親的性溝通愈自在，則其發生性行為的比率愈低，其也愈願意延後性行為；Miller、Kotchick、Dorsey、Forehand 及 Ham (1998) 的研究則指出，當青少年母子的溝通愈開放以及接納，則討論頻率愈高，且母子間對事件的理解愈一致，也就是說，透過開放誠懇的溝通，青少年方能有效地認知母親的溝通訊息。

Neer 與 Warren (1988) 進一步發現，「支持性」溝通分數高的母親，較願意與孩子談論各項與性有關的主題，可見溝通氛圍會影響性溝通頻率。Neer 與 Warren 探討支持性性溝通的效果及其影響因子，他們發現高支持性的父母比低支持性的父母，在性溝通的方式方面，更會主動與孩子談「性」，或利用機會跟孩子談「性」(如：看電視時)。而在跟孩子談的過程中，也更能接受孩子對「性」的觀點，或更願意分享自己的經驗以及談論跟「性」有關的感受。研究也發現，父母親的性態度會影響其支持性的溝通情形，認為性行為只能發生在相愛的伴侶之間以及伴侶間應該開放的性溝通等兩項態度分數愈高，支持性的性溝通情形亦愈佳。

由以上可知，支持性的性溝通方式，對青少年具有正面影響力，值得作為親職教育的參考。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是想了解父母在與孩子談「性」時，所表現出來的「支持性」是否與父母的親子溝通頻率有關？亦即是否高支持性的父母，與孩子談性頻率愈高。而與支持性性溝通有關的溝通信念與態度有哪些？以作為設計親職性教育的參考。

防衛性／支持性溝通研究所使用的量測工具方面，早期研究多以觀察的方法，紀錄研究對象口語或非口語的支持性或防衛性溝通特徵 (Barton et al., 1988)，晚期雖有自陳式量表發展，但多半是量測一般性的溝通，非針對親子間談「性」的溝通過程所編制 (Eadie, 1982; Rozema, 1986; Stamp et al., 1992)。特定針對親子間溝通「性」議題時的防衛性與支持性特徵編制的則有 Neer 與 Warren (1988) 研究發現親子間性溝通的支持性能預測談性的頻率，也容易讓孩子感覺有收穫 (Warren & Neer, 1986)。由於本研究主題為親子間的

性溝通特徵，與此份量表的編制目的相符，因此研究工具將引用此份量表。

除此之外，過去相關研究在測量性溝通的內容時，多半是列舉與「性」直接相關的主題，例如：懷孕、避孕、性交、月經…等，不同的作者所列舉的主題不盡相同。然而，這些主題只是「狹義的性」所包含的範圍，狹義的「性」與性行為（例如：性交、射精）有關，多半是日常親子互動時不易碰到的議題，也比較難啟齒。Warren 和 Neer (1986) 認為測量這些主題，不但使研究結果顯示頻率偏低，也無法完全反映父母與孩子談「性」的內容。其實，父母與孩子所談的內容，可能更多是「廣義的性」所包涵的內容，不只有性行為，美國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4) 將之稱為「Sexuality」(中文翻譯為全人的性)，內容包括人一生發展過程中的性健康、性心理以及性社會各層面之議題，例如：生長發育、兩性交往、性別角色、身體自主權…等。再者，一個良好的親子性溝通不是僅僅溝通「知識」而已，更應該包含相關「情緒面」或「價值面」的分享 (晏涵文、黃富源，2002；Rosenthal, Feldman, & Dewards, 1998)。對進入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性」的發展，是一個新的經驗，成長的過程總是充滿種種疑惑與不安，父母若能適時的關心並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才能真正的協助孩子的發展。因此，本研究探討性溝通的內容時，將主題區分為「廣義的性」與「狹義的性」兩部份，並了解影響這兩類主題的溝通因素是否不同。

目前國內並無一研究探討性溝通過程與品質變項對性溝通頻率之影響，因此本研究為探索性質，作為親職性教育設計以及未來深入研究之參考。

本研究重要名辭解釋如下：

### 1. 防衛性溝通

根據 Gibb (1961)，防衛性溝通的特徵包括：評斷的、控制的、謀略的、中性化的、優越感的、確定的等，本研究由「支持性性溝通」量表 (Warren & Neer, 1986) 來測量。

### 2. 支持性溝通

根據 Gibb (1961)，支持性溝通的特徵包括：描述的、問題取向的、自然散發的、同理的、平等的以及暫時性的等，本研究由「支持性性溝通」量表 (Warren & Neer, 1986) 來測量。

### 3. 狹義性議題

由狹義的「性」(Sex) 所定義下的性議題，與「性行為」直接有關，通常敏感度較高，比較難以啟齒。本研究包含如：性交、自慰、性病、避孕…等。

#### 4. 廣泛性議題

為廣義的「性」所定義下的性議題，內容包括人一生發展過程中的性健康、性心理以及性社會各層面之議題。本研究為與「狹義性議題」有所區分，廣義性議題之內涵不包括狹義性議題。廣義性議題由於不直接與性行為相關，敏感度較低，因此通常比較容易啟齒。本研究包含如：兩性交往、生長發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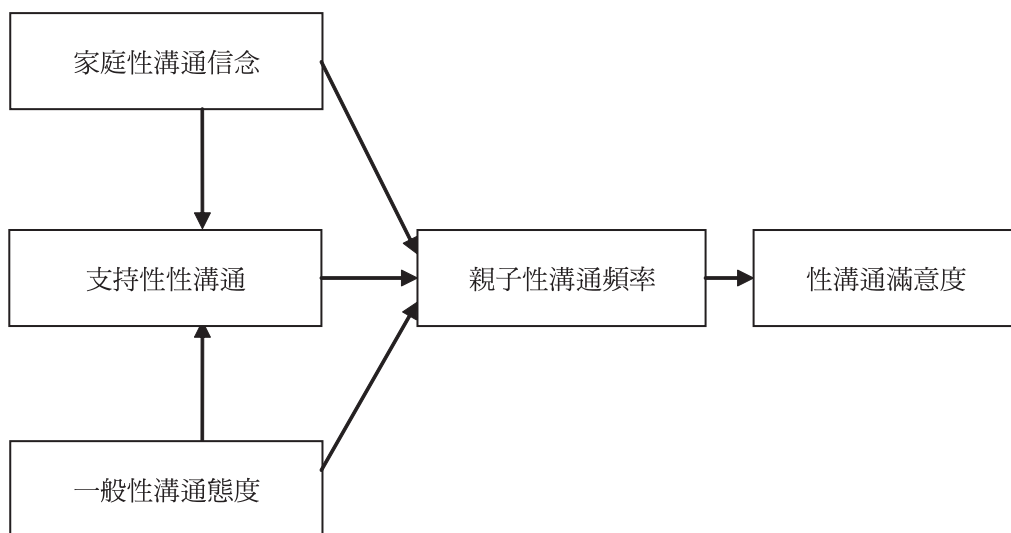
## 貳、研究方法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父母為對象，採用方便樣本，對一所高中與一所高職家長日來校參加親職性教育演講活動的家長進行施測。實際發出問卷 168 份，廢卷 9 份（遺漏值過多者、答案明顯勾選同一選項者），最後可用問卷 159 份。父母親的平均年齡 46 歲，男性 50 人，女性 109 人。孩子的平均年齡約為 17 歲，男女比例約為 2：1。研究對象及其配偶教育程度均介於高中職與大專院校畢業。婚姻狀況中，有 148 位已婚（93.1%），2 位離婚（1.3%），7 位喪偶（4.4%），2 位其他（1.3%）。

### 二、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突如圖一所示



圖一 研究架構圖

###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除了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等資料外，還包括「性溝通議題」17題，「支持性性溝通」9題，家庭性溝通信念3題、一般性溝通態度3題、性溝通過程8題，以及性溝通滿意度1題（問卷見附件）。分別說明如下：

#### 1. 性溝通議題問卷

研究者參考國內外研究（廖梨玲、洪栩隆，2006；Fisher, 1998; Neer & Warren, 1988）自編此份問卷，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將議題依其敏感性自行區分為兩類，一類為廣泛的「性」議題（如：兩性相處、尊重身體自主權），共7個主題。第二類為狹義的「性」議題（如：性交、避孕），共10題。性溝通量表除了測量主題外，亦測量每個主題被論的程度。在 Neer 和 Warren（1988）的研究中，並沒有測量主題被討論的程度，而廖梨玲與洪栩隆（2006）的研究則是以三點量表合併測量研究對象談論各主題時經驗到的自在程度，因此本研究參考 Fisher（1998）的量表將量尺分為五分李克特量表，測量每一題被討論的主觀程度：4 = 常常，3 = 還算常，2 = 偶爾，1 = 幾乎不曾，0 = 從來沒有。由於性議題是較為敏感的議題，因此期待有不少家長可能在某些敏感議題上從未曾談過，即為0（從來沒有）；有些家長則可能談過一次或兩次，就再也不談論，即親子性溝通研究上所謂的「one big talk」，家長可能是認為只要談論過，孩子就懂了（Foston, 2004），在選項上可以1（幾乎不曾）來代表。17題依其討論頻率加權相加總求平均，得分愈高表示頻率愈高。本量表信度 Cronbach's  $\alpha = .95$ 。

#### 2. 支持性性溝通量表

本研究引用 Warren 與 Neer（1986）以及 Neer 與 Warren（1988）兩位學者所編製的「支持性性溝通量表（The Supportive Sex Discussion Scale, SSD）」。此量表以 Gibb（1961）所提出的「防衛性溝通」與「支持性溝通」為基礎編制，Gibb 的理論為一般性的溝通理論，而此量表則應用理論中的溝通特徵，設計題目測量父母在特定的談「性」議題上，與孩子談論時所表現出的「防衛性」與「支持性」特徵。原量表共九題，其中有6題反應 Gibb 的「防衛性」溝通特徵（評斷的、謀略的、控制的、確定的），題目如：「與孩子談時大部分是我在說」（控制的）；另外3題則反應「支持性」溝通特徵（暫時性的、同理的、問題解決的），題目如：「對於孩子跟我說的有關“性”的事，我都能心胸開放地接受」（暫時性的）。量表為 Likert 五分量表，以5 = 非常同意，4 = 同意，3 = 中立意見，2 = 不同意，1 = 非常不同意的方式計分。由研究者翻譯成中文並與相關領域學者與博士研究生討論修正

後定稿。此外，學者表示，防衛性與支持性分數是位在同一個連續性分數的兩端，因此計分時，「防衛性」溝通的題目採反向計分，九題得分相加求平均得一個分數，是為「支持性性溝通」分數，分數愈高，表示溝通時的支持性程度愈高（Gibb, 1961; Neer & Warren, 1988; Rozema, 1986）。Neer 和 Warren（1988）研究中，此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Cronbach's  $\alpha = .83$ ，本研究測得此量表內不一致性信度係數則為 Cronbach's  $\alpha = .63$ 。

為了解本量表的因素結構是否能反映 Gibb（1961）理論以及兩位學者所稱的「支持性」與「防衛性」溝通題目，本研究以 EQS 軟體進一步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結果顯示，模型卡方值 25.52 ( $df = 24$ )，適配指標 CFI = .989；SRMR = .053；RMSEA = .020，均達適配標準，且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表一）。兩個因素相關為 .285，亦達顯著差異，進一步驗證了量表所反應的理論。

表一 支持性性溝通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

題目	支持性性溝通因素負荷量	
	防衛性F1	支持性F2
與孩子談時大部分是我在說	.615	
孩子不接受時我變得沒耐性	.663	
依自己性價值標準評斷孩子	.446	
很猶豫揭露自己與性相關事	.348	
常告訴孩子不要對性太感興趣	.479	
不知道要談什麼	.308	
支持態度面對孩子個人性感覺		.705
能心胸開放接受孩子跟我談		.478
使孩子敞開心胸說性		.348

### 3. 「家庭性溝通信念量表」與「性溝通態度量表」

本量表參考 Neer 與 Warren（1988）測量父母對家庭性溝通的一般性想法之題目，原問卷有四題，其中一題「我寧可孩子同我談性，而不是同他的朋友談性」由於題意擴及對孩子與同儕談性之態度，因此予以刪除不用，故此部分共有 3 題，其中題目如：「我所談的有關性的事，對孩子影響很小」。

「性溝通態度」則測量父母對「性溝通」的一般性態度，Neer 與 Warren (1988) 所制定之題目亦原有四題，其中「避孕主要還是女孩子的責任」，由於題意與對「避孕」的態度較有關，而與「性行為」本身以及「性溝通」較無關，因此刪除不用，故此部分共有三題，其中題目如：「性行為應該以愛作基礎」。量表為五分量表，5 = 非常同意，4 = 同意，3 = 中立意見，2 = 不同意，1 = 非常不同意，得分愈高，表示所持有的信念或態度愈正向。

#### 4. 性溝通過程量表

性溝通過程欲探究溝通的過程特徵，特別是引發性溝通之方式，以及引發後，對議題處理的方式。本量表共 8 題，參考 Neer 與 Warren (1988) 兩位學者的問卷，四題測量父母用以引發性溝通的方式，如「看電視時才談到」；另外四題測量開始談「性」之後，父母以何種方式處理溝通過程，例如：「接受孩子的觀點」。

#### 5. 性溝通滿意度

此部分題目只有一題，測量父母親認為在與孩子溝通性的滿意程度，選項有五個，分別是：1 = 非常不滿意、2 = 不滿意、3 = 中立、4 = 滿意及 5 = 非常滿意。

###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7.0 與 EQS 軟體進行統計檢定。性溝通頻率、溝通過程、支持性的性溝通、家庭性溝通信念以及性溝通態度等變項間的關係，以複迴歸分析以及卡方分析檢定之，迴歸分析控制父母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變項。支持性的性溝通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以 EQS 軟體進行之。

## 參、研究結果

### 一、性溝通的主題與頻率

在十七個性議題中，有約 3.8% (6 位) 父母從未跟孩子談論過任何一個主題。有約 45.3% 的父母幾乎不曾與孩子談論過這些主題，而只有約 20.8% (33 位) 的父母十七個主題均曾跟孩子談論過。

其中最常談論的前三個主題為「身體、生理發展」(86.9%)、「選擇異性朋友」(86.5%)、「尊重身體自主權」(85.1%) 等；最不常談論的三個主題為「手淫」(40.4%)、「夢遺」(44.4%) 與「性交」(52.3%)。

以 17 個性議題進行因素分析，了解其因素結構是否如當初設計區分為兩類，乃以主成分分析配合斜交轉軸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三個因素（見表二），解釋變異約 69.9%。七題「廣泛的」性議題，一如預期均落在同一個因素中；然而 10 題「狹義的」性議題則被劃為兩個因素，其中有 8 題落在一個因素中，另外兩題落在另一個因素中，這兩題是「手淫」與「夢遺」，似乎是較為禁忌、更難啟齒的議題，其曾被談論過的比率也最低，因此命名為「禁忌性」的性議題，另外 8 題則維持原名為「狹義的」性議題。

三類議題談論平均數最高者為「廣泛性議題」（ $M = 1.88$ ），接近「偶而談」這個選項；其次為「狹義性議題」（1.09），接近「幾乎不曾」這個選項；最少為「禁忌性議題」（.65），介於「從來沒有」以及「幾乎不曾」之間。無母數相依樣本 Friedman 分析顯示三者談論的頻率有顯著差異（ $X^2 = 178.14$ ； $p = .000$ ）。可見，家庭對於廣泛性的議題之談論還是高於與「性」比較直接相關的「狹義性」議題，而對於統計所分出的第三類議題「禁忌性議題」，家長是最不知如何處理的。

表二 性溝通主題主成分分析因素負荷量、溝通百分比與溝通頻率

題目	溝通主題因素負荷量			曾談論 (%)	溝通 頻率*
	第一	第二	第三		
愛滋病	.803			68.0%	1.40
其他性病	.774			59.7%	1.13
墮胎	.759			52.9%	1.00
避孕方法	.734			53.2%	.97
懷孕	.733			60.5%	1.26
娼妓問題	.728			58.7%	1.02
性交	.726			52.3%	.85
同性戀	.693			65.4%	1.26
尊重自己與他人身體自主權		.880		85.1%	2.23
面對異性感到害羞很正常		.814		81.4%	1.92
不讓性行為受同儕與對方壓力		.732		72.5%	1.62
婚前不發生性行為		.687		79.9%	2.08
選擇異性朋友		.618		86.5%	2.13
身體、生理的發展		.609		86.9%	2.06
與孩子分享青少年時期的性事		.506		63.6%	1.16
手淫			.881	40.4%	.61
夢遺			.843	44.4%	.72

\*溝通頻率：4 = 常常，3 = 還算常，2 = 偶爾，1 = 幾乎不曾，0 = 從來沒有

## 二、影響性溝通頻率之因素

為了解影響性溝通頻率之因素，本研究將支持性性溝通、家庭性溝通信念、性溝通態度等變項，對性溝通頻率總分與三個子類（廣泛性議題、狹義性議題以及禁忌性議題），分別進行複迴歸分析，迴歸控制父母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年齡等變項，以控制人口變項影響力。

結果顯示，「支持性的性溝通」以及家庭性溝通信念中的「所談的事對孩子影響很小」兩個變項對溝通總分以及「廣泛性議題」具有預測力，當溝通愈具支持性，或愈認為自己所談對孩子的影響小時，則性溝通頻率愈高。另外，「性別」對「廣泛性議題」亦有顯著預測力，母親的親子溝通頻率高於父親。對於「狹義性議題」溝通的預測，則只有「支持性的性溝通」具有預測力。而對於「禁忌性」議題而言，沒有任何一個具有預測力，見表三。

表三 性溝通頻率複迴歸分析

項目	Beta值			
	性溝通 總分	廣泛性 議題	狹義性 議題	禁忌性 議題
性別	.108	.192*	.076	.078
年齡	-.168	-.119	-.078	-.017
教育程度	-.042	-.078	.009	.022
信任孩子判斷	-.067	-.095	-.110	-.050
希望孩子常跟我談	-.028	.024	-.021	-.080
所談的事對孩子影響小	.278**	.225**	.147	.101
性行為應以愛作基礎	.121	.132	.086	-.018
伴侶要公開且誠實談性	-.117	-.123	.055	.136
性行為前要溝通有關避孕	.099	.063	.062	-.008
支持性的性溝通	.260**	.291***	.248**	.150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三、影響支持性的性溝通之因素

本研究將父母性態度以及父母家庭性溝通信念，對支持性的性溝通進行複迴歸分析，並控制父母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年齡等變項。結果如表四所示，兩項家庭性溝通信念對支持性性溝通有預測力，即愈信任孩子的判斷及愈認為自己所談的事對孩子影響很小，則支持性的性溝通得分愈高。一項性溝通態度達顯著預測力，愈認為性行為之前要先溝通有關避孕的事，則其性溝通支持性愈低。此迴歸模式達顯著 ( $F = 3.97$  ;  $p = .001$ )。

表四 支持性性溝通複迴歸分析

項目	Beta	T	Adjusted R <sup>2</sup>
性別	-.004	-.046	.185
年齡	-.035	-.453	
教育程度	.008	.102	
信任孩子判斷	.235	3.052**	
希望孩子常跟我談	.067	.839	
所談的事對孩子影響小	.326	4.237***	
性行為應以愛作基礎	-.012	-.134	
情侶要能公開且誠實性溝通	.153	1.675	
性行為前要溝通有關避孕	-.200	-2.093*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 四、高、低支持性的性溝通父母其溝通過程與溝通滿意度情形

本研究以平均數作為分界點，將父母之支持性溝通區分為「高支持性」與「低支持性」兩組，比較其性溝通過程中所使用的方式，以及其性溝通滿意度。

高、低溝通支持組與四個溝通開始方式（分別為：電視播放「性」相關內容時、等孩子主動來問、先跟孩子談別的、直接問孩子）與四個溝通維繫方式（分別為：都是讓孩子說、接受孩子觀點、我的態度開放且誠實、告訴孩子我想聽什麼），進行卡方檢定。統計結果發現，兩組父母其性溝通開始方式並無顯著差異，但在性溝通維繫方式中之「接受孩子觀點」以及「我的態度開放且誠實」兩項，高支持組得分高於低支持組。

表五 高低支持性溝通與溝通維繫方式卡方檢定

	支持性溝通		卡方	p值
	高支持度 (n = 76)	低支持度 (n = 76)		
	n (%)	n (%)		
接受孩子觀點			6.10	.014
有	39 (51.3%)	24 (31.6%)		
無	37 (48.7%)	52 (68.4%)		
態度開放且誠實			9.87	.002
有	61 (80.3%)	43 (56.6%)		
無	15 (19.7%)	33 (43.4%)		

表六 高低支持性溝通與性溝通滿意度ANCOVA檢定結果

	<i>M</i>	<i>SE</i>	<i>df</i>	<i>t</i>	<i>p</i> 值
性溝通滿意度			157	-4.835	.000
高支持組	3.257	.71			
低支持組	2.733	.74			

就性溝通滿意度而言，控制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之後的 ANCOVA 結果顯示，高支持組的父母性溝通滿意度較高。

#### 肆、討論與建議

過往親子性溝通研究在處理性溝通議題時，多半沒有注意區別議題的性質。有些研究有進行歸類，但各研究歸類方式不盡相同，且多缺乏理論基礎，使得研究結果不易比較。其實，父母跟孩子談「性」時，多會從比較廣泛、不敏感、或比較容易談的內容方向去談，而對於與「性」或「生殖」直接相關的主題，可能會因議題的敏感性而較少談論。Warren 和 Neer (1986) 指出，他們發現在家庭性溝通中，狹義的性議題（例如避孕），出現在廣泛的性議題（如兩性交往）之後，在家中比較沒有談論的是狹義的性議題，而非廣泛性的性議題，因此，如果不區分性議題的性質，將無法對家庭性溝通及其效果有正確了解。

與 Warren 和 Neer (1986) 的理念相類似，本研究發現性溝通議題按其敏感程度可以區別三類，不但溝通頻率不相同，其溝通影響因素也不相同。這三類為：廣泛性議題、狹義性議題以及禁忌性議題。其中廣泛性議題討論最多，這些議題與孩子的生長發育、兩性交往有關，也包含親子間對「性」或「異性」之感受的分享。討論最少的是禁忌性議題，包含手淫與夢遺兩項，這兩項跟性反應直接相關，父母比較不知道如何談論。與廖梨玲及洪翎隆 (2006) 的研究相似，他們發現「男性自慰或勃起」是獲得父母最少討論的議題，而「尊重兩性差異」為獲得最多討論的議題。可見，議題的敏感性影響父母的討論意願。

本研究發現影響這三類議題的溝通因素也不相同。溝通支持性愈高的父母，談論廣泛性議題以及狹義性議題的頻率亦愈高，但對禁忌性議題卻沒有預測效果。可見，支持性的性溝通技能可以協助父母與孩子談「性」。林燕卿和晏涵文 (1999) 也發現，親職性教育教導與溝通有關的內容，可以有效提升父母的溝通自我效能。「支持性」溝通的特徵為「不評斷」（以「描述」取代）、「不控制」（以「問題取向」取代）、「不謀略」（以「自然散發」取代）、「非中性化」（以「同理」取代）、「不帶優越感」（以「平等」取代）以及「不過分確定」

(以「暫時性」取代)(Rozema, 1986)。亦即，在跟孩子談「性」時，父母最好不要在心理上站在優越地位跟孩子談話，如此容易引起孩子相當的防衛性，乃是要放下身段，以「平等」取代，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並去同理孩子的感受。父母都走過青春期的尷尬與懵懂，大部分也都希望當時自己的父母能體會自己的感受，適時協助。同樣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同理」，即便是談論比較醫學或客觀的內容時，也要避免過度的「中性化」，顯得冰冰冷冷，缺乏人性，乃是可以敞開心懷跟孩子分享自己的經驗，讓雙方有機會彼此同理與交流。當孩子的觀點與自己的觀點左右時，避免立刻以「評斷」的態度去反應，卻應退一步，以「描述」問題或觀點的方式，弄清楚異同之所在。溝通過程中，也應避面意圖「控制」溝通的方向，可以「問題取向」就事情的本質，真誠的討論。討論時，不應採取某種「謀略」，乃是要就著自己的真心，「自然地」散發關懷與感受，例如：當不知道問題的答案時，或擔心性行為的危險時，都可以誠實地說或自然地分享感覺。如此，相信孩子們必能感受到父母真心的關懷。此外，對許多知識道理，應保有彈性，抱持著道理或現象都可能是「暫時的」或「不必然如此」的心態，避免流於僵化的「過分確定」。學會這些溝通技能，必能有效地提升親子「性」溝通的頻率與效率。

但是對於禁忌性議題而言，支持性溝通技能、家庭性溝通信念以及性溝通態度等均無預測力，可見有除了溝通之外的其他影響因素。其中，可能與父母對「性」的認識不足，對「性」議題過分敏感，以及對自身的「性價值觀」缺乏適當的澄清有關，當一個人對「性」了解愈少，對該如何說或說什麼則愈沒有把握，以至於對「性」難以啟齒。例如 DeSalvo 和 Zurcher (1984) 就發現，在子女的管教情境中，父親對自己管教能力的自我評估與防衛性溝通呈現負相關。若能提升父母對「性」的正確認識，必能提升其談「性」的教養能力。「性態度重建」(Sexual Attitude Reconstruct) 或「性態度重評估」(Sexual Attitude Re-assessment) 是近年來引進台灣協助性教育、性諮商與性治療專業人士自然且正確跟學生或案主互動的訓練。其理念指出，對「性」有正面的認識，降低對「性」議題的敏感度，並自我澄清性價值建立之過程，才能自然、自在地談「性」，也才能有效地協助學生或案主(阮芳賦、蘇敏慧，2004)。父母雖非性學專業人士，但是若能對自身「性」價值觀有適當了解與澄清，降低談「性」時對「性」的敏感度，則有助於建立正確性觀念，也有助於性溝通，未來在進行親職性教育時，應設計相關活動協助父母了解「性」，並做價值澄清。

另外，研究也發現，當父母對自己的溝通效果愈沒有期待時，愈能放開心胸去談論廣泛的性議題。傳統社會的父母對孩子多半採較權威的教導態度，擔心青少年從事危險行為，因此想要控制孩子，並患得患失，這樣反而容易對談「性」裹足不前。因此，父母應該以平常心看待性議題，它只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重要議題的其中一個，跟所有其他的家

庭議題一樣，青少年對父母的看法不一定全然接受。父母若能秉持這樣的態度，談「性」就不是一件艱難的事。很可惜，研究發現，這個態度只跟廣泛性的性議題相關，因此，親職教育應該鼓勵父母也以這種態度談論較為敏感的「狹義性議題」與「禁忌性議題」。

支持性的溝通技能對親子性溝通頻率有顯著影響，而當父母愈信任孩子、對溝通效果愈沒有期待，則支持性性溝通得分愈高。根據 Gibb (1961) 的論述，支持性溝通是一種開放的溝通方式，其在論述到「控制」(防衛性溝通)此項特徵時，提及支持性溝通者尊重對方，不會視對方為沒有能力作決定的人，亦即信任對方溝通與做決定的能力。因此，愈信任孩子的父母，愈能表現出溝通的支持性。此外，Gibb 在論述到「問題解決傾向」、「謀略」、「暫時性」等特徵時則強調，支持性溝通者對溝通的問題不具有強迫的預設立場，他／她是問題解決傾向的、沒有隱藏的動機與意圖，尋求雙方合議的解決方法，也是願意根據合議嘗試而行的。相反的，當一個人的溝通不開放，隱含多重動機，則訊息接收者會感受到對方的隱晦立場而提高防衛性。因此，如果父母在與孩子溝通性的議題時，具有隱藏的說服動機，期待孩子的反應如自己所預期，則很有可能表面上嘗試支持對方，但其多重動機卻阻礙了他／她持續以支持性來溝通，其實，也會讓孩子在接收訊息時失焦，一直聚焦在父母背後真正的意圖，也升高了其防衛性，降低溝通效率。因此，父母不必對溝通效果持過多期待，如此，才能使溝通具有支持性。研究也發現，高支持的父母與孩子溝通時，自身的態度是開放且誠實的，也隨時準備接受孩子觀點。可見，良好的性溝通，建基於對孩子要適當的信任、接納孩子的觀點、對效果不要過度期待，且自身保持誠實開放的態度。大部分的父母總覺得不知從何開始跟孩子談「性」，其實，跟孩子談「性」，首先要成為一位「可以談」的父母，亦即，讓孩子感覺可以跟自己談「性」這個議題 (Huberman, 2005)。而愈能誠懇地跟孩子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跟孩子談感受，且能接納孩子對「性」的好奇與觀點的父母，愈能給孩子安全感，孩子也愈願意敞開心胸跟父母談「性」。這些都是親職性教育或諮商時，可以提供給父母的正確談「性」態度。

有趣的是，性溝通態度中，愈認為性伴侶性行為之前要先溝通有關避孕的事，則其性溝通支持性愈低。張允中及林燕卿 (2006) 研究發現，單親父母對避孕的態度與親子性溝通頻率之積差相關為負向，意即，對避孕持負向態度者，其性溝通頻率愈高。然而，當將所有變項進入多元迴歸分析，控制其他性態度變項的影響後，兩者之間的相關轉為正向。可見，避孕態度與親子性溝通之間，可能存在著其他中介因素。或許個人的性態度愈開放，例如，愈能接受一夜情，則其愈傾向在性行為前確認對方有做避孕措施；反之，一般較為保守或有穩定婚姻關係者 (例如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則其愈不感覺需要在性行為前確認對方是否避孕。故愈同意此題者，愈可能是性態度較開放者，而本研究顯示，「性行

為應該以愛作為基礎」與「支持性性溝通」無顯著相關，因此，可能本研究發現溝通避孕之態度與支持性性溝通之間的關係為一種假性的相關，性關係的特性（穩定與否）以及性態度的保守與開放程度是可能的中介因素。然而，這仍需要未來進一步探究。

本研究對親子性溝通的主題以及影響因素進行了初步探究。依據研究結果之建議如下：研究發現，議題愈敏感，溝通頻率愈低。支持性的性溝通技能有助於提升親子性溝通頻率，親職教育或諮商應教導父母「支持性」溝通的技能，以提高父母的溝通效能。另外，要鼓勵父母先做一位「可以談」的父母，以平常心看待性議題、不會對溝通效果過度期待、信任孩子、接受孩子觀點，並開放且誠實地跟孩子分享自身經驗、想法與感受。「性」本身就是敏感的議題，大部分的人都缺乏自然談「性」的能力，特別是遇到敏感性較高的主題（如夢遺），如果父母對「性」以及自己的性價值觀有正確的認識與適當的澄清，降低談「性」的敏感度，必能提升溝通效能，因此，建議親職性教育可以設計活動使父母有機會澄清自己的性價值觀，降低對「性」議題的敏感性，並建立正確性觀念，以提升親子性溝通頻率。

對未來研究方面，影響親子性溝通因素相當多，未來研究設計可探討更多家庭性溝通信念因素或父母自身的性態度因素。特別是禁忌性議題的溝通，父母本身的性價值觀如何影響此議題的溝通？需進一步探究。另外就是父母對避孕的態度，其與性溝通之間是否存在中介變項？也可以進一步探討。而良好的性溝通因素如何影響孩子的性觀念與性行為，如：是否性溝通過程愈具支持性，孩子愈願意接受父母觀點？愈願意延遲性行為或愈願意使用避孕措施？這些都值得未來研究。

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為家長日來參加親職座談的父母，這些父母本身可能是比較關心孩子的父母，平日與孩子的溝通互動可能也較沒有來的父母良好，因此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於沒來參加的父母，未來在進行父母親方面的親子性溝通研究時，可以用其他方法收集資料（例如：郵寄或請學生帶回家），以了解結果是否相同。再者，本研究樣本數並不大，雖然統計過程控制相關人口學變項影響力，研究發現也都能與理論相符以及呼應過往研究，但未來仍需要更大的樣本，以了解本研究結果是否可以複製。

## 參考文獻

- 阮芳賦、蘇敏慧（2004）。SAR（性態度重建過程）在臺灣的應用。高雄：樹德科技大學。
- 林燕卿、晏涵文（1999）。親職性教育介入效果之研究。衛生教育學報，12，159-181。

- 林惠生 (2002, 5月)。臺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學生之性知識、性態度及危害健康行為與網路之使用。論文發表於臺灣性教育協會舉辦之第五屆第二次年度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台北。
- 晏涵文、蘇鈺婷、李佳容(2001)。國小高年級學生性教育現況及需求之研究。臺灣性學學刊, 7(2), 1-22。
- 晏涵文、黃富源(主編)(2002)。家庭性教育。台北: 一家親文化。
- 晏涵文(2004)。性、兩性關係與性教育。台北: 心理。
- 晏涵文、劉潔心、鄭其嘉(2009)。臺北市五專五年級學生近三十年約會與性行為變化趨勢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 25, 251-274。
- 單玉安、鄭其嘉、孫鳳卿(2008)。高中職學生性溝通、性態度及其受同儕關係類型影響研究—以高雄市為例。臺灣性學學刊, 14(1), 23-36。
- 張美皓、晏涵文(1995)。臺北市國二學生與母親溝通與「性」有關主題之研究。臺灣性學學刊, 1(2), 14-23。
- 張允中、林燕卿(2006)。單親家長對青春期子女「性」溝通之探討。中華輔導學報, 20, 175-200。
- 廖梨伶、洪栩隆(2006)。主要照顧者與青少年於性議題之溝通現況調查研究—以彰化縣國中小學生為主要對象。臺灣性學學刊, 12(2), 1-12。
- 羅樊妮(2004)。父母管教方式、異性交往之親子溝通與青少年異性交往態度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羅于惠、鄧鳳苓、瞿馥苓、林雪蓉、史麗珠(2008)。桃園地區高職學生性知識及性教育需求的調查研究。學校衛生, 52, 55-70。
- Alexander, J. F. (1973). Defensive and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s in family system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5(4), 613-617.
- Alexander, J. F. (1979). The reduction of cognitive conflict: Effects of various types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3, 120-138.
- Baker, W. H. (1980). Defensiveness in communication: Its causes, effects, and cures.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7, 33-43.
- Barton, C., Alexander, J. F., & Turner, C. W. (1988).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in normal and delinquent families: The impact of context and family rol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 390-405.
- Becker, J. A. H., Ellevold, B., & Stamp, G. H. (2008). The creation of defensiveness in social interaction II: A model of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among romantic coupl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75(1), 86-110.
- Becker, J. A. H., Halbesleben, J. R. B., & O'Har, H. D. (2005).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and burnout in

- the workpla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2(2), 143-150.
- Brody, E. B., Ottey, F., & Lagranade, J. (1976). Early sex education in relationship to later coital and reproductiv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Jamaican wo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3(8), 969-972.
- Darling, C. A., & Hicks, M. W. (1982). Par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sexuality: Implication for parents as educator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11, 231-245.
- DeSalvo, F. J., & Zurcher, L. A. (1984). Defensive and supportive parental communication in a discipline situation.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7, 7-17.
- Dubbe, M. C. (1956). What teen-agers can't tell parents and why? *The Coordinator*, 4(3), 3-7.
- Eadie, W. F. (1982).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revisited: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Gibb's theory. *The Southern Speech Communication Journal*, 47(2), 163-177.
- Fisher, T. D. (1998). Weighted topics measure of family sex communication. In C. M. Davis, W. L. Yarber, R. Bauserman, G. Schreer, & S. L. Davis (Eds.), *Handbook of sexuality-related measures* (pp. 131-1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ston, N. A. (2004). *How and when to have 'the big talk': Answering the tough questions and finding the right answers for your childre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10 from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7/is\\_9\\_59/ai\\_n6100478/](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077/is_9_59/ai_n6100478/).
- Fox, G. L. (1981). The family's role in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In T. Ooms (Ed.), *Teenage pregnancy in a family context* (pp. 73-130).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ibb, J. R. (1961).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142-148.
- Guzman, B. L., Schlehofer-Sutton, M. M., Villanueva, C. M., Stritto, M. E. D., Casad, B. J., & Feria, A. (2003). Let's talk about sex: How comfortable discussions about sex impact teen sexual behavior.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8(6), 583-598.
- Huberman, B. (2005). *Are you an askable parent?* Retrieved May 7, 2010 from <http://www.advocatesforyouth.org/storage/advfy/documents/askable.pdf> Advocates for Youth/.
- Jaccard, J., Dodge, T., & Dittus, P. (2002).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97, 9-41.
- Kingstone, J. C., & Endler, N. S. (1997). Supportive vs defensive communications in depression: An assessment of Coyne's interactional model.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29(1), 44-53.
- Lefkowitz, E. S. (2002). Beyond the yes-no question: Measuring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bout

- sex. *New Direc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97, 43-56.
- Miller, K. S., Kotchick, B. A., Dorsey, S., Forehand, R., & Ham, A. V. (1998). Family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What are parents saying and are their adolescents listening?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30(5), 218-222.
- Neer, R. M., & Warren, C. (1988). The relationship of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to sex discussion in the hom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 5, 154-160.
- Newcomer, S. F., & Udry, J. R. (1985).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 *Family Planning Perspectives*, 17, 170-174.
- Pistella, C. L. Y., & Bonati, F. A. (1999). Adolescent women's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e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xual behavior.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Work Journal*, 15, 305-315.
- Rosenthal, D. A., Feldman, S. S., & Dewards, D. (1998). Mum's the word: Mothers'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about sexuality with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1, 727-743.
- Rosenthal, D., Senserrick, T., & Feldman, S. (2001). A typology approach to describing parents as communicators about sexuality.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0, 463-481.
- Rozema, H. J. (1986). Defensive communication climate as a barrier to sex education in home. *Family Relations*, 35, 531-537.
- Robbins, M. S., Alexander, J. F., & Turner, C. W. (2000). Disrupting defensive family interactions in family therapy with delinquent adolesce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4), 688-701.
- Sexuality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4). *Guidelines for 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3rd ed.). New York: Author.
- Spanier, G. B. (1977). Sources of sex information and premarital sexual behavior.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3, 73-88.
- Stamp, G. H., Vangelisti, A. L., & Daly, J. A. (1992). The creation of defensiveness in soci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0(2), 177-190.
- Warren, C., & Neer, R. M. (1986). Family sex 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86-107.
- Whitaker, D. J., & Miller, K. S. (2000). Parent-adolescent discussions about sex and condom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5, 251-273.

##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pportive Sex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Beliefs, and Parent-child Sex Communication

Chi-Chia J. Cheng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Han-Wen Ye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ieh-Hsing Li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sing-Jung Chang

Shin-Kong Hospital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ental supportive sex communication, family sex communication beliefs, sex communication attitude,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bout sex topics. Participants were 159 parent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a senior high school and a vocational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Taiwan. Research tools included the Supportive Sex Communication Scale, Sexual Communication Topic Questionnaire, Parental Beliefs about Family Sex Communication Scale, and General Sex Communication Attitude Scale.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exual communication topics generated three factors: General sex topics, Specific sex topics, and Taboo sex topics. General sex topics obtained the highest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mean score and the Taboo sex topics obtained the lowes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controlling for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dicated that the three sex topics differed in predictor variables.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mmunication frequencies on General sex topic and Specific sex topics. The less expectation parents held for their talks, the more frequently they talked about General sex topics. However, none of the predictor variable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ommunication frequencies on Taboo sex topics. Furthermore, ANCOVA and chi-square analyses showed that supportive parents were characterized as being more open and honest, having more trust toward their children, having more respect for their children's opinions, and having less expectation for effects of their talks. They also had higher satisfactory scores on parent-child sex communication.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school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programs were also made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parent-child sex communication,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